



六论

重加作品研究

六 论

雷加作品研究

刘甘栗 编

目 次

写在前面的话	杨聪凤 (1)
一.用自己的声音歌唱	
——雷加创作印象	吴访益 (8)
二.论雷加散文艺术	
林建忠 (21)	
三.雷加短篇小说浅论	
陈东 (43)	
四.披尘拣金自晶莹	
——略论雷加报告文学的特色	郭润葵 (65)
五.浅论雷加纪实文学	
白志伟 (89)	
六.为有源头活水来	
——雷加长篇小说创作浅论	吴访益、白志伟 (105)
编者赘语	
刘甘栗 (126)	

写在前面的话

杨聪凤 教授

这里收集的是厦门大学中文系九一届学生陈东、吴访益、白志伟、林忠建、郭润葵的毕业论文，说白了，是他们毕业前夕完成的一份综合性的作业。作业而能变成铅字，已属可喜，而这些铅字出现在他们离校近十年，事业初成之际，那就更耐人寻味了。我以为，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论文本身的学术水平如何，而在乎青年人的选择和努力方向，更在乎老一辈的作家雷加同志对青年人的提携之心，奖掖之意，在于雷加同志对青年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作的取向与努力的肯定与鼓励。

我对陈东任班长的这个班是比较熟悉的，对他们几位甚至十分赞赏，觉得他们积极、热情，有理想、有朝气，敢想、能说、会写，只要路走对了，前途不可限量。然而我也明白，他们缺乏的不是才华，而是深厚的根基。他们没有经历过什么革命的洗礼，连生活的磨难也没真正尝过，甚至连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都知之甚少，春风春雨的滋润、强有力的臂膀的扶持，能使他们茁壮成长，一阵西风狂扫，也可能使积淀于他们心灵中的民族传统荡然无存。他们是踏着改革开放的战鼓跨入大学校门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何曾想过前进的路上会是如此坑坑洼洼，路障重重？他们几位都经受了八

九年春夏之间的那场政治风波的考验，事后都曾坦诚的说：“我们实在太嫩了！”

是啊，他们还太嫩。这虽然不是他们个人的什么过错，而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带给他们的一种弱点，一种遗憾，但必须正视它，远离它，就象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急剧变化时期必须克服自身的软弱性，必须克服脱离工农群众的倾向一样，不然，后果也是难以设想的。想想“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现实，即使撇开那些别有用心者不说，到处横冲直撞地批判这个批判那个，却并不了解该不该批，该批什么的人，难道我们还见得少吗？在我们周围，我们也曾不断地听到人们在大声疾呼反“左”或反“右”，实际上，真正知道什么是“左”、什么是“右”的人又有多少？在我们耕耘的这块土地上，我们也曾听过有些人由衷地赞同改写已经看得烂熟的人类史、革命史、文学史，但是否人人都明白什么该改，什么不该改？

当然，我这里说的不是陈东他们，而是一种时代症状，是不能不警惕的。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八十年代中，当我给刚跨进厦门大学校门的中文系学生讲授《文学概论》时，有不少学生强烈地呼吁我们进行教学改革，不要满堂灌，不要老以中国名著作例子，呼吁我们打开国门，让学生了解西方现代派文学。当时中文系已开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的课程，即使没开，《文学概论》也不是《西方现代派文学概论》，但西方现代派文学理应当成为文学理论课的研究对象之一。何况，我们尊重学生的要求，很想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和学习的主动性，于是在系领导的支持下，《文学概论》教学组确实认认真真进行了一番“革命”：每讲一章之前，都发给他们比较完整的材料，里面包括了围绕这章的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理论和作品，要求他们认真学习，深入思考，提出问题，充分讨论，得出结论。他们盛赞西方现代派作品，我们也因势利导，选一些比较好懂的作品，如《气球》，让他们讨论，鼓励他们把自己的见解说出来。他们欢呼雀跃，积极准备，不料一到讨论却卡了壳，最推崇

这篇文章的同学居然要求老师先讲出这篇作品的意思。我吃惊之余问道：“你既然连作品的意思都看不出，怎么赞赏它？”其回答更让我吃惊：“一篇作品一看就懂有什么意思？”我一时无言以对，同学们却哄堂大笑起来。不过，说来也怪，这次讨论后，同学们对西方现代派作品的赞扬之声似乎骤然冷了下来。

这件事给我一个启示：年轻人喜新厌旧不足为怪，他们在强烈的求知欲、求新欲驱使下提出种种疑问，甚至怪论都不可怕，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学习、讨论、实践来自我解难排惑，前提是不拒绝学习，不拒绝了解事情的发展过程和历史的来龙去脉。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当陈东他们为毕业论文的选题而苦苦思索时，我也跟着动起了脑子。按规定，学生可以自选题目再找指导老师，也可以在老师拟好的选题中挑适合自己的题目来做。也就是说，老师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出题让学生做，但必须有人选你的题才行。我该为他们出什么选题呢？出些当时热门的文艺理论论题当然很新，也很紧跟形势，但我认为，一个中文系的本科生，应利用毕业前的宝贵时光，尽可能地掌握本学科的史实，并学会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它，得出正确的结论。在许多人趋于浮躁的年代里，更应该如此。我们要求学生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果他们对自己所在的领域完全不了解或知之甚少，他们怎么“唯物”法？又怎能“辩证”得起来？于是，我想起了我本人从一无所知到由衷尊敬，手头上也有一定资料的老作家雷加同志。

说起来惭愧，读了整整五年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我却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位写了那么多作品的叫雷加的作家。当我第一次脑中有雷加这个名字时，已是1980年秋后的事。当时，我和西北大学中文系的李文瑞同志（已故）在中山大学进修，同居一室，很谈得来。她屡次说起雷加，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建议我进京后一定要认识这位老人。还说：“就你思想性格看来，等你见了他，你一定会对他感

兴趣。”这是人家的看法，我听罢笑笑，并不当真。此后不久，我在为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提要》和《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提要》而在全国上下苦苦搜索现当代长篇小说目录和作品时，进一步知道雷加写有长篇小说《潜力》三部曲，包括《春天来到了鸭绿江》（后改题《春到鸭绿江》）、《站在最前列》和《蓝色的青冈林》，但找不到作品，我也就无从拜读，更谈不上什么印象。

后来，我参加了重庆出版社组织的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解放区文学书系·报告文学卷》（黄钢主编）的选编工作，而小说卷的主编就是雷加，于是我有幸在编委会上见到了雷加，并不止一次听他发言，这才真正开始了对他的认识。乍一见面，我毫无见了古稀老人之感，只觉得他是一位高大壮实、声音宏亮，待人亲切的一位谦谦长者。讨论会上，他常常是先静静地听别人发言，认真地做笔记，不打断别人的发言，甚至不大插话，但他一开了口，你就明显感到他是有备而来，有理有据，一套一套，理论鲜活、功底十分厚实。我没见他跟人脸红耳赤地争论过，但言词之间，原则性和坚定性是显而易见的。我私下对李文瑞说：“这是一位棉里藏针的角色，谁要想在和他的辩论中击败他，绝非易事。”他似乎颇有将军风度，喜欢让人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接受他的观点。于是，我深深地感到，这是一位很有学问的，蕴含很丰富、厚实的作家。

从此，凡有机会进京，我都会抽空去看看雷加。进了他家的门，那整洁朴素而又充满文化气息的环境，会让你不用思索便感到这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家。雷加本人待人十分诚恳，没有客套，没有架子，你可以象到自己十分熟悉的长者家一样地轻松。他夫人伊苇同样亲切得有如一位好大姐，他儿子仿佛是一位有教养的普通劳动者，没有一丁点儿高干子弟的傲气。在饭桌上，大家谈时事、论新闻，没有长幼之别，也无主客之分，其乐融融，让人不忍离去。

至此，雷加的确给我留下了很好很好的印象，是我自己感受到

的真切的印象。及至我读了一些资料，对雷加的出身、经历、创作历程、文学思想和艺术成就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后，我更是对雷加有了一种由衷的敬佩，深感他是一位很不一般的作家：他经历丰富、学识广博，却从不张扬，始终以平常人的心态，脚踏实地地继续他的新征程；他一辈子深入生活却并不沉溺于生活，而是高屋建瓴地审视生活，挖掘生活中的美；他不仅能驾驶各种文体，而且在理论上又有很高的造诣。遗憾的是，理论界对他的研究显然是很不够的。

把雷加这样的作家放到现实生活中一比，我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当代中国有那么多追星族，这些“族人”对星们的仰慕几近疯狂。年轻人追星，实际上是追自己的理想和偶像，没什么可非议的，但追星的原因却是可以也应该研究的。如果这些“族人”对文学、对艺术，对其所追的内含有更多的了解，他们还疯得起来么？作为肩负重任的当代大学生，该不该不问流星、恒星地加入这一族？我认为，他们应该避免盲目的趋向，扎实实地研究历史，研究现实，他们才会明白路该怎么走。想想看，如果每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都能对鲁迅、茅盾这些大师们的奋斗史感同身受，他们还会任人不负责任地改写中国文学史么？如果他们都真切地知道了，在中国还有许许多多成绩卓越却尚未被人充分认识的文学家，这些人在半个多世纪里，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着走了过来，在工厂、农村、贫困地区和人民群众一起战斗过来，累遭挫折而百折不挠，无怨无悔，对党对革命事业忠贞不二，功勋卓著却从不言功，他们还会为个人的些许成就沾沾自喜，裹足不前么？于是，我觉得，陈东他们的毕业论文，不该满足于总结人家的研究成果，而应该是一次主动学习之后的充分显示自己的水平的学习心得，他们应通过学习和写作，使自己从思想到业务都有较大的收获。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陈东他们，还说，雷加是一位值得研究的作家，你们不妨先读读他的作品。读后如果没什么感觉，那就算

了；如果你们能被感动，觉得有心得可写，那你们几位可在雷加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特写和美学思想方面各选一个自己真有心得的方面去写。就这样，他们通读了我手头上有的雷加的作品，经过了跟我一样的对雷加从无知到有所知的过程，不仅不觉得雷加跟他们有什么代沟，而且对雷加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觉得值得研究，可以写，于是就写了，有的人还写了不止一篇。

我想，如果用学术成果的标准来看这些论文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失望。即使是这些文章的作者，在经历了十个年头之后的今天重读自己的论文，也会为自己当年的幼稚而笑出声来的。然而，我给雷加同志寄论文复印件的初衷就不在于说明论文有如何了不起的学术价值，而是想说明：即使是在这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在各种各样的思潮、观点如潮涌入的情况下，在青年人大反传统，对一切“新”的东西追之唯恐不及的情况下，只要有人为他们指明方向，提供一些条件，他们同样能静下心来做些扎实的调查，得出正确的结论的。陈东他们能在闹哄哄的环境中，认真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追寻着一位从延安出来的老作家几十年的足迹，寻找其闪光之点，让它照亮自己的前路，化为自己的思想，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我记得，丁玲同志 1984 年 6 月 14 日至 18 日到厦门大学出席丁玲研究会期间，在泉州参观时曾说过一句令我难忘的，越回味越有意思的话：“国门要打开，思想要设防。”其实她这是在用文学的语言阐述了邓小平的思想，在提醒国人，特别是搞意识形态的，当教师的，千万别忘了在做改革开放的促进派的同时，做好思想上的防资、防毒工作。如今陈东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表现得很出色，对此应是深有体会的。

2001 年 2 月 1 日

作者：厦门大学中文系 1991 届学生
毕业论文指导教师

用自己的声音歌唱

——雷加创作印象

吴访益

雷加同志是位老作家，也是一位忠于生活忠于时代的作家，又是一位多产作家。对于他的文学创作，仅从体裁、题材、内容等方面加以表象性分析是很不够、同时也是很不科学的。我拟从三个方面谈谈对雷加作品的体会。

一、雷加作品中体现出强大的人的意志， 着重表达人在险恶环境里的不屈、抗争。

从四十年代的《鸭绿江》到七、八十年代的《江河行》、《向纬度挑战》，雷加的作品中“人的意志”这一主题都得到很好的表现。他笔下的人物，直面人生，既不抱怨，也不气馁，永远竭尽全力去迎接一切可能的灾难和困难。

1、着力表现人们在险恶的自然环境里的挣扎。

最早的这一类作品的代表是《鸭绿江》。其中木排一节着力表现了这一主题。这一节主要写“木把子们”，“几百里几千里去到人

们说不清的地方”，背井离乡，去谋生活。写他们的艰辛，更通过艰辛写他们顽强地生存。在这里，作者着重写了歪脖子哨的险恶：

“说起歪脖子哨，那里江身突然被两旁的峭壁夹紧了，水面高起来，跳过一块块礁石，向一个平平的深潭流去。

深潭的底下藏着一股旋流，它甚至可以把一片落叶吸入水底。深潭与峭壁之间仅有二十米，而且要转折三十度角。木排走到这里，只有先朝岩壁撞去，然后在适当的地方急转而下，才得脱险。

这是尽人皆知的吸人的血口……”

当“木排象一支箭似的朝岩壁冲去了”的时候，木排和人只有两个结果：“或者滑一个角度安然通过”，“或者訇一声撞得粉碎，然后无声无息地被旋流吸去。”

即使在这种极有可能粉身碎骨、人船俱亡的情况下，一代又一代的“木把子们”依然似乎熟视无睹地涌向歪脖子哨，闯过这个鬼门关去闯关东！

如果说《鸭绿江》中所描写的是一群为生活所迫的“木把子们”对于环境的反抗的话，《江河行》中，这种描写显然减弱，而代之以通篇透出的一种情绪：“船如此，人呢？人与船决不甘心同一命运。”“川江号子是生命之歌，是歌唱自己的力量。”这种情绪是贯穿于作者行文的始终的，并溶融在对于鸭绿江、长江今昔变化的叙写中。对于人的意志作用于自然的记叙和描写也是有的，但加入了更深的情感色彩：

“但是当年生活在鸭绿江上的人，都是些英雄好汉。有的挖参，有的放排……这是一幅多么值得描绘的图画呵！”“时时刻刻都要闯险滩、渡暗礁……千难万险刚过去，又迎来了新的险情。”要冲过这些险滩，“先是要有一股天大的勇气，它要直对着迎面的巨大岩石奔去。是的，直奔巨石，不偏不倚，流速使两眼发花，眼看下一秒钟就得粉身碎骨……也唯有在这一瞬间，才显出人的意志和智慧。谁能及时拨正航向，谁就能从巨石边擦身而过。人，终于战胜

一切，胜利了。”“江河虽然摆出倔强可怕的面孔，在一场场严肃的斗争中，人的意志和力量总是可以驯服它的。”在这里，人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得到极大的张扬。

面对给人类以毁灭性打击的恶性自然灾害，雷加笔下的人物也是镇静自若，迎击突如其来的事变。《洪水之夜》、《手》是这类作品的代表。《洪水之夜》写接产科护士长薛凤和及同事在洪水来临之时，迎着不断上涨的洪水，给产妇接生。写她们艰苦卓绝的努力：“担架必须立刻移到肩上，担架离水面不远，有如轻舟，但它的一侧压了一下，产妇落水了，又被冲走了，他们只凭拖拽着的衣裤或是头发，又在水中找到了她，又把她放在担架上，齐心协力地抵住水的冲力，才爬上了楼梯……”本文最后一句“又听见新生婴儿的啼声，”似乎蕴含着人的意志的胜利，新的力量的产生，意味隽永，还是表现着这个主题。《手》是《抗震篇》里的一篇，写的是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唐山人民奋起抗震的事迹。作者没有去渲染宏大的场面，而是选取一个点、一两个人，写他们在地震来临之际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写他们自救和救人。在描写过程中，作者还是强调了人的力量和勇气。他写道：“在生死存亡中，两只手握在一起，才有力量，”“这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就象幼芽拱土的力量不可估量一样。”“两只手救了自己，那四只手不但可以救出自己，又可以再去抢救别人。”“这些手变得更加有力，它们创天辟地地劳动着。”

2、着力表现人们在更为复杂更为严峻的社会环境里战天斗地改造世界的勇气和力量。

长篇小说《潜力》三部曲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小说通过塑造何士捷、岳全善、徐家光等一系列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来达到揭示这一主题的目的。

共产党员何士捷是这三部曲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人物，可以说处于核心的地位，由于工作的需要，党安排他去一家造纸厂完成恢

复生产的重大任务。他当时面临的社会环境是异常复杂和恶劣的。从大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不久，蒋介石匪帮在美帝国主义的武装支持下，疯狂进攻我东北解放区，刚刚到来的和平又被战乱所代替。蒋介石加委了原来的汉奸，派出大批特务，这些人在维持会的幌子下，粉墨登场，散布各类谣言，组织所谓“地下军”，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新生的民主政府刚刚成立不久，因为这些反革命活动的猖獗，一度安定的社会生活又回到混乱动荡和不安中。只有对蒋匪帮的反革命活动实行迎头痛击，才能保卫革命成果。但战争需要钱，任何能支援自卫战争的工矿企业，在这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何士捷所要去的那家工厂的小环境看，也是十分复杂和混乱的。粮价正涨，伪保管委员会主席帮着奸商迫害工人；大批工人食不果腹，饿着肚子拉三轮、摆香烟摊或心灰意懒地蹲在墙跟晒太阳，工人们对复工没有信心，他们憎恨日本人，对八路军也并不怎么相信，对国民党却抱着一种盲目的希望。工厂里铁梁上结着冰，玻璃上挂着灰，皮带静止不动，水管子闪着冰冷的面孔，不冒烟的烟囱筑着鸟窝，庞大而复杂的机器象一匹匹巨兽蹲在那里。就说何士捷自己，他对造纸工业一点也不熟悉。何士捷没有被如此复杂如此蔓无头绪的困难所吓倒。他深信：“每件事情的开端，困难和希望总是连着的，怕困难就是放弃希望。”并立即着手恢复生产的工作。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工厂需要转移。这又是一系列的困难：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物品，可是时间那么仓促，运输工具那么缺少，这是一场怎样激烈的战斗啊！即使转移到长白山区以后，也还有许多困难需要解决：那么多人的衣食住行需要解决，长白镇和对岸惠山之间的江桥需要重新修筑。而这一切又都是处在战争这个动荡不安的大背景上。更不用说，在革命队伍中，还混杂着极少数个人主义的堕落分子、地富反坏分子。何士捷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任何困难面前从不退缩。不仅如此，他总是担当最困难的

工作，并领导广大工人战胜困难。

岳全善也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人物之一。他机智勇敢、老练沉着，总是在风险里闯进去，又闯出来，连一根毫毛也没有损伤。他是“一个明快的人”，拥有“勇敢的自信，和彻头彻尾的战斗精神。”他是一个不知疲倦地工作，不知疲倦地向困难斗争的人。他的衣服从来没有干过，永远沾着水、石灰或是油漆。即使受伤了，还要撑着伤体到车间去工作。

徐家光这一形象也体现了作者所要表达的强大的人的意志。《潜力》第三部《蓝色的青冈林》第八章《手里握着杓子》中，写徐的爱人衣廷秀不慎从四楼摔下，徐家光当时正在大楼旁边的厨房里，用一只长柄木杓在锅里搅着稀饭，她不知掉下来的是衣廷秀，还以为是她哥哥徐家齐。她一方面焦急和担心外面发生事故，心里也想去看看哥哥的伤势，但意志使她克服了这种软弱的思想，她不停地搅着粥锅，不能停下来，因为那时生活非常艰苦，粮食极为缺乏，这是为正在修复工厂而紧张劳动的工人们的食粮。当徐家光知道摔下来的是衣廷秀时，由于猛烈的刺激，以至昏死过去。可是醒来后，她并不跟汽车送衣廷秀去医院，而是留下来，因为“再有十分钟，就该给工人开饭啦”。这样一直到傍晚散了工，她才到医院去看望衣廷秀。这里支配着徐家光一切行动的，不是感情，而是理智，是人在意外灾变面前冷静沉着的意志力。

3、在一类不以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和科普小品式的散文中，也深深打上了人的意志的烙印。

雷加有些散文写得有点像科普小品，因为科学性、知识性是这些文章较为主要的特点。这些文章里边几乎没有人物形象。至少不以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因此，不大容易去表现人的意志。但是作者在行文之中，不自觉或自觉地把主观色彩揉进这些文章的写作中，使这些文章深深打上了人的意志的烙印。

作者虽然没有去刻画人物，但着重写人的活动，又通过人的活

动,去表现人的意志,《向纬度挑战》、《沙的游戏》等即是这类代表作。

《向纬度挑战》写橡胶等作物种植地区在纬度上的推进与扩展,着力表现人们运用自己的智慧,为了生产建设的需要,去征服自然。“现实生活中要求钢铁与橡胶的比例是 100:1.5,这象人的生命要求红白血球有一定比例一样。”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我们没有达到这个要求。于是人们从“五湖四海集结起来”,开展“大兵团作战”,充分调动人的智慧,经过无数次试验和无数套工序的培育,终于完成了,这么大胆而又不可思议的战斗:把橡胶的种植区由北纬 18 度推进到 21 度。作者想要体现的,就是:“人的智力可以调遣纬度。”

《沙的游戏》的上篇侧重介绍沙的游戏的知识,写得天真而有趣,充满了迷人的魅力。下篇才露出题旨:并非为写游戏而写游戏。一开篇就写道:“这又是一场人与沙之间的游戏。游戏常常是战斗的化身,所以它又是游戏,又是一场战斗。”这里的战斗,就是指人类对于沙漠“有计划的进攻。”是人类对于野性未驯、狂暴肆虐的沙漠的步步为营、咄咄逼人的围攻。文章中着重讲了库布各沙漠,讲库布各沙漠中一条长 13 公里公路的保护工作。通过人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在这十三公里的公路周围,大约三千五百亩的土地上,布满了各种植物群落,一眼望去,在这黄沙之上,染上了各种斑块,……它的绿色……象是天幕一般覆盖下来……那些沙丘也象金字塔般岿然不动了。”沙丘终于被固定了,这又是人的意志的胜利。

雷加作品中对于人的意志的肯定,是时代精神的要求和体现。雷加所处的时代,正是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时代,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尤其需要肩负着改天换地的神圣使命的人们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雷加高度的理性把握住时代跳动的脉搏,顺应了时代要求,高度褒

扬和热情呼唤人的意志和人格精神。同时，雷加作品中对于人的意志的肯定，又是和雷加同志的性格特点，生活态度分不开的。雷加的童年是在奔走中度过的，他从小开始就对人类生存与命运的探索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到了延安以后，他一直以生命的“内在激情”与生活的“高昂的基调”去写作。雷加写作的过程也是战斗的过程。对于人的意志的高度肯定与宣扬，正是作者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的写照。

二、雷加作品的个性与自我

对于雷加的作品，许多研究者注重和强调它们扎根于生活，扎根于时代的时代性。当然，勿庸置疑，雷加作品的时代性是一个突出的特点。但也应该承认，雷加的作品同时也是极赋个性和自我特点的。

1、从作品内容及题材的选取看。

雷加作品的内容和雷加本人的亲身经历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童年》、《鸭绿江》等是他童年生活的写照；抗战前后所写《平津路上》、《五月的鲜花》、《一支三八式》也几乎都是亲历的实记；《我们的节日》、《潜力》三部曲几乎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在丹东造纸厂的工作情况；一九五六年后的三、四年间，他参加了洛阳拖拉机厂的建设工程和三门峡水利建设工程，写出了报告文学《神门河之战》和工地散文《命名的传说》、《工地的早晨》；粉碎“四人帮”后，他沿着黄河奔跑，写出《心的歌》、《黄水谣》、《黄河在咆哮》。在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象他那样，作品的选材完全依据自己亲历的生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看完雷加同志所有的作品，对他的生平也就会看出大概的轮廓，有些具体方面，比如在丹东造纸厂工作的几年间，甚至一些大致的线条都很清楚。对于雷加而言，创作是工作和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工作和生活也同创作水乳交融地交织在

一起。

雷加作品的内容和题材绝大多数是自己亲历的人和事,但并不是所有亲历的事,他都要形之于文学,写成作品。实际上,雷加给这些题材加了个范围,即在亲历的基础上,还要是前人或别的作家没有写过的。八十年代初,作者在东北考察时,曾经积累了许多材料,但其中许多材料都已为别人所写过,作者决然放弃这些已被别人写过的材料,只写了《瑷珲这个地方》《江东六十四屯》等文章。现在看来,这些文章确实很有特色、很有个性。

雷加在选材上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偏爱小事件,长于以小见大。记述时代风云,大多自己要进入作品,因而事件微型化,有时甚至是琐碎化。唐山大地震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件,唐山人民的抗震救灾应该毫无疑义地是一个极典型极重大的事件。可是作者在选材上却偏偏选择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件。《抗震篇》里有一篇十分出色的《手》,着重选取了矿工老李和小于两双手,在地震发生后不久即投入自救和救他人的抗震救灾活动,这样,以点代面,表现了灾区人民不屈服于天灾的英雄气概。《潜力》三部曲是一部较早地反映我国工业建设题材的作品。这部作品所反映的事件,是雷加选材中最重大,但相对于这部作品所潜藏的丰富内涵和深刻的思想内容来讲,选取的事件还偏小。《潜力》三部曲不仅要艺术地再现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地区的伟大历史变革,表现国民党大举进攻东北时期,东北地区发展过程中复杂而尖锐的斗争。事实上,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上看,《潜力》肩负着回答一个十分重大的历史问题的任务:日本投降以后,部分地区已经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解放出来,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必将取得胜利。但是共产党能否领导胜利后的中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工业建设?对于这个问题,《潜力》三部曲作出,也不得不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2、作品所表达的情绪,显示的倾向,以及哲思、感悟具有浓重